



[瑞典] 彼得·奥斯贝克 著

倪文君 译

周振鹤 校

中国和东印度群岛 旅行记



RAIN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HAD PREVENTED
ME FROM GOING ABOARD.
I THEREFOR WENT WITH
THE SPANISH WATER-BOATS
TO FORT ST. MARY,
AND FROM THENCE
IMMEDIATELY PROCEEDED
ON THE ROAD TO
PORT REAL,
TO WHICH TOWN
I HAD GOT
TOWARDS THE EVENING,
BUT I RETURNED,
AS I LONGED
TO BE AT MY FORMER
INN AGAIN.
I FOUND THE
FOLLOWING
PLANTS IN BLOOM...

OF THIS I FOUND NO
MORE THAN
TWO PLANTS, ONE MALE,
THE OTHER FEMALE;
AS THEY WERE
BUT
A FEW YARDS
FROM ONE ANOTHER...

THE MEADOWS WHICH
HAD NO INFLOURE
WERE ORNAMENTED WITH...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K919

24

2006



中国和东印度群岛 旅行记

[瑞典] 彼得·奥斯贝克 著

倪文君 译

周振鹤 校

BADLY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HAD PREVENTED
ME FROM GOING ABOARD.
I THEREFORE WENT WITH
THE SPANISH WATER-BOATS
TO FORT ST. MARY,
AND FROM THENCE
IMMEDIATELY PROCEEDED
ON THE ROAD TO
PORT REAL.
TO WHICH TOWN
I HAD GOTTEN
TOWARDS THE EVENING,
BUT I RETURNED,
AS I LONGED
TO BE AT MY FORMER
DINN AGAIN.
I FOUND THE
FOLLOWING
PEASANTS IN BOTTOM.

OF THIS I FOUND NO
MORE THAN
TWO PEASANTS, ONE MALE,
THE OTHER FEMALE.
AS THEY WERE
BUT
A FEW YARDS
FROM ONE ANOTHER.

THE MEADOWS WHICH
HAD NO UNCULTIVATED
WERE GREENED WITH...

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 / (瑞典) 奥斯贝克著; 倪文君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9

ISBN 7-5633-6192-8

I. 中… II. ①奥… ②倪… III. 游记—作品集—瑞典—近代 IV. I53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186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9.5 插页: 1 字数: 250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5 000 册 定价: 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斯德哥尔摩大学中国学教授，北欧孔子学院院长，瑞典皇家人文、历史与考古学院院士罗多弼先生在奥斯贝基墓旁留影



瑞典教堂



奥斯贝公墓全景



奥斯贝公墓墓碑

序

彼得·奥斯贝克(Pehr Osbeck)《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A Voyage to China and the East Indies*)的中译本得以出版,是中瑞文化交流史上一件意义重大的事。该书最早的版本是1757年的瑞典语原本,不久后被翻译成了德语和英语,这是第一份公开出版的瑞典访问者在中国的旅行报告。

作为著名的博物学家查尔斯·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的学生,彼得·奥斯贝克以一名随船牧师的身份跟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卡尔亲王号(Prins Carl)来到中国。这艘船于1750年11月18日从瑞典西海岸港口哥德堡出发,于次年8月22日抵达广州,并在那里一直停留到1752年的1月4日。

在中国停留的这四个半月期间,奥斯贝克搜集了相当多有关中国植物的资料,同时他也将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中国文化的观察记录了下来。他的观察不但真实可靠,而且大多十分敏锐,有时还能滤除从书本上读到的或是道听途说的一些成见。

林奈希望能够搜集到世界各地的相关资料,并以此为基本素材,在他的《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中对所有自然物进行规模宏大的分类,因而他周游各地,尤其是在瑞典境内游历,并留下了一些有关

其所到之处的宝贵记录,这些记录文笔优美而有见地,而他的一些学生足迹也曾到达世界上其他遥远的地方。1731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使得他的一些门徒有机会到亚洲游览,林奈非常希望彼得·奥斯贝克——他的得意门生之一——能够造访中国,因为他相信奥斯贝克能将这一任务完成得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出色。当奥斯贝克回到瑞典后,果然向林奈展示了数百种的新植物种类。林奈非常高兴,他试图说服奥斯贝克再度游历中国,他说:“毫无疑问,在一次航行中,你所能做到的比其他一百人加起来的还要多。”然而,奥斯贝克始终没有能实现他的第二次中国之行。

1723年,奥斯贝克出生于离哥德堡不远的一个乡村,他家境贫寒,父亲在他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在接受正式教育之前,奥斯贝克已经在父母的教授下学会阅读。由于他在学校里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因此获得了经济上的资助,这使他的学业得以继续,也因此,他能够在乌普萨拉大学进一步深造,学习神学和博物学。

奥斯贝克从中国回来后,林奈为他安排了一个职位,即在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中担任家庭牧师。几年以后,在1760年,他开始担任哈斯罗夫(Hassl.v)和沃克斯托普(V.xtorp)的教区长——这是位于瑞典西南部哈兰省(Halland)一个小教区。1805年,他溘然去世。

就在奥斯贝克造访中国的差不多同一时间,林奈的另一位学生奥洛夫·托瑞恩(Olof Torén)乘坐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哥特狮号(G.ta Lejon)也来到了中国。托瑞恩曾撰写了七封书信汇报他在中国期间的所见所闻,这些信件被收入此书,现在也一并被翻译成了中文。

彼得·奥斯贝克是第一个将在中国的实地调查报告公开出版的瑞典人,但他却并非第一个撰述有关这一方面内容的人,早在17世纪末,乌普萨拉大学就出现过两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一篇描写长城,写于1694年;另一篇介绍“大中华帝国”,写于1697年。

在整个18世纪中,“中国观”在瑞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之

所以出现这种对于中国的兴趣,则要归功于瑞典东印度公司与华贸易的展开。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大量中国生产的物品带到瑞典,同时该公司又在瑞典经济史上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其存在的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内(1731~1813),至少有130个航次来往于哥德堡和广州之间,这一贸易往来使瑞典获取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新信息。

18世纪中叶,一些与皇室关系密切且有影响力的人将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从法国带到了瑞典:中国是一个由哲学家统治的国度,是值得竭力仿效的典范。1753年,也就是奥斯贝克回到瑞典后的第二年,皇后洛维萨·乌尔里卡(Lovisa Ulrika)收到了一份庆祝她33岁生日的礼物:一座中国官。

彼得·奥斯贝克对于中国的文化有一些正面的评价,例如,他说,“由于历史悠久,他们有关天地和历史的知识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的道德信条被视为经典,法律和行为准则被认为是最好的生命箴言。医学和博物学都建立在长期的经验上,他们农业水平的完善让人羡慕”。但他同时却指出,“由于缺乏对上帝真知的了解,他们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因之黯然失色”。一方面他承认中国人“谈吐文明,举止文雅,勤于社会生活,做生意特别有天赋”,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他们“顽固,骄傲,并且多疑”。

奥斯贝克的旅行见闻中对于中国文化这些正面和负面的评价,如同钟摆在天使和魔鬼之间摆动,向今人很好地展现了瑞典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摆动在天使和魔鬼之间的钟摆,其极端往往是隐蔽的意识形态情感的表达,而并非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描述。我们需要多些真实的描写,少些意识形态的喷发。从总体上看,尤其是在其悉心搜集的植物学资料这方面,彼得·奥斯贝克的记述确实非常写实,并且对于1751年的广州的情况也有非同一般的洞察。

翻译彼得·奥斯贝克的《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是一项艰苦

的工作,对于倪文君小姐能在我的好朋友周振鹤教授的指导下完成这项工作,将一位 18 世纪瑞典学者的作品译成漂亮的中文,作为一个瑞典人,我感到十分令人鼓舞。

斯德哥尔摩大学中国学教授

北欧孔子学院院长

瑞典皇家人文、历史与考古学院院士

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于瑞典纳卡

2006 年 4 月 20 日

前 言

18 世纪的广州海舶辐辏，外商云集。继葡萄牙人借居澳门，以之为据点打开与华贸易的通道之后，欧洲各国也纷纷远航中国，试图在东方贸易的巨额利润中分得一杯羹。

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瑞典对华贸易也是从成立东印度公司并对其颁发特许状开始的。然而由于长期称霸波罗的海引起周遭邻国的不满，瑞典被迫卷入了 18 世纪初期那场长达二十余年的北方战争中，战争将成立东印度公司的计划搁置了起来，直到 1731 年瑞典东印度公司方才成立，较之英、荷等国晚了一百多年。

据罗多弼先生研究，瑞典东印度公司从建立到 1813 年结束，83 年中，共有 132 个航次来华贸易，平均每年不到两艘船，交易量并不大。这一时期的中瑞贸易平稳地开展，不带任何殖民色彩，与其他来华贸易的西洋各国相比，这个中国人所谓的“蓝旗国”显得和平友好，不挑事端。除了广为人知的哥德堡号沉没这一特殊事件，在 17、18 这两个世纪中，中瑞之间始终保持着贸易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不少来华的瑞典人也曾记录下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只是至今为止尚未受到研究者太多关注。本书即是这样一份珍贵的史料。

本书以业师周振鹤先生所藏英文版《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

(*A Voyage to China and East Indies*)(伦敦,1771年版)为底本翻译,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主体部分是瑞典东印度公司随船牧师彼得·奥斯贝克(Peter Osbeck)的一份航海日志。奥斯贝克1723年5月出生于瑞典哥德堡,1805年12月去世,师从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后成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随船牧师,足迹曾至西印度群岛、南美洲、东南亚以及中国。他热衷于博物学,对于所到之处的自然风貌、动植物以及农业生产都观察入微。奥斯贝克于1750年11月18日乘坐新造好不久的卡尔亲王号商船从哥德堡出发,并于1752年6月26日返回哥德堡。这是卡尔亲王号商船首次远航,其间在西班牙加底斯停留了两个多月,在中国广州停留了4个多月。在这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奥斯贝克坚持不懈地记下沿途的见闻,由于作者除了是随船牧师外,更是一位博物学家,因此在书中可以读到大量对于植物和动物的描写。除此以外,作者还详细地描绘了西班牙、东南亚以及中国的风土人情,其中对广州商馆区和郊区的观察尤为细致,他的笔下展现出一幅生动的18世纪广州风情画卷。

本书的第二部分由七封信组成,这些信是由另一艘瑞典商船哥特狮号的随船牧师奥洛夫·托瑞恩(Olof Toreen)所写,该船与卡尔亲王号在同一年先后抵达广州。托瑞恩虽然没有像奥斯贝克那样记下航海日志,但他通过信件的形式描述了在苏拉特、中国以及航行途中的观感。由于作者同奥斯贝克一样,对于博物学怀有极大的兴趣,同时也受命于林奈,对沿途动植物进行了仔细观察,因此在他的这些信中也有不少博物学内容。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一份简短的记述,作者是瑞典东印度公司船长查尔斯·古斯塔夫·爱克堡(Charles Gustavus Eckeberg),这份记述是其对广州近郊的农业、种植业、畜牧业以及渔业的观察报告。

对于本书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1. 本书原文为瑞典文,后译为德文,再译为英文,故中译本的注共有四种,第一种是作者原注,第二种是施雷贝尔博士的注释(注的末

尾用 D. S. 表示),第三种是英译者所加之注(注的末尾用 F 表示)^①,第四种是中译者注(注的末尾亦有说明)。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注释明显不是作者原注,但在英译本中并未说明何人所注,中译本从英译本,需请读者自行辨明。

2. 本书中出现的地名和事物名称,有许多是作者根据当时当地的读音记录下来的,与现在的用语与读音已不一致,在翻译过程中已尽量复原,若实在无法复原的,则保留其原文,以求教于大方。

3. 原书中有大量植物和动物的拉丁文学名,其中一些沿用至今,可以通过工具书查找出相应的中文名;有些名称由于修订或重新命名而发生了改变,现在只能查出其种属而不能找到确切的中文译名,因此在书中将其种属同拉丁学名一同列出;还有少数无论种属或名称都无法查明的,则保留原文。

4. 书中还有不少对动植物的细节描写,由于这些描写对于今天的动植物学研究来说已经过时,而对于历史研究亦无甚作用,因此在中译本中将其略去,省略的部分会在书中一一注明,便于感兴趣的读者查找原文。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曾承教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罗多弼教授(Prof. Torbj. rn Lodén)、澳门高等校际学院范岱克教授(Paul A. Van Dyke)、复旦大学黄洋教授、中山大学周湘副教授以及董少新博士,此外,友人孙艺和刘思雅也对部分原文提出了翻译建议,在此一并致以深挚的谢意。译者水平有限,翻译错误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大雅教正。

倪文君谨识

2006 年 4 月 4 日

^① 英译者序中对此有所说明。

给弗林特郡唐宁(Downing, in Flintshire)的 托玛斯·佩南特(Thomas Pennant)先生

亲爱的先生：

承蒙不弃，我定毫不犹豫地支持此书的出版。

您不但准许这部书出版，并且加入了许多重要内容使之得以扩充，而它也成了我们交谈的经常性话题。然而我所做的并不只是协助当前这项工作而已，由于您的关照，我这个对贵国完全陌生的人，结识了许多慷慨而可敬的朋友，与他们的相识是我的荣幸，让我感到十分高兴。

我最初受到您的注意乃是由于我们的研究方向相似，然而，一些发生得过于频繁以至于可能被忽略的事实让我对您的仁慈更感亲近，那就是，当我的困苦震动着您的心灵时，您亲切而友善地将这些忧伤拂去。

凡此种种，无以为谢，只有请求将您的名字留在这些旅行记之前，以对您最适时的关切公开致谢。显然适度地表达谢意才会教人愉悦，因而就此我不再多说了，然而，请允许我怀着感激的心诚挚地祝福您，愿您和您的家庭永远快乐、生活幸福，希望您能坚持对知识和美德的兴趣，并因此更感幸福。作为一位资助者和前沿研究者，尤其在博物学上，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已如此卓越，也愿您因身为本国贫苦

大众的神父而感到荣耀和愉悦。

谨向亲爱的先生,致以最真挚的问候!

您最顺从卑微的仆人

约翰·赖恩霍尔德·福斯特(John Reinhold Forster)

沃灵顿

1770 年 12 月 1 日

编者序

对一个像英国这样的文明国家而言，这部译作很难不被接受，因此我完全可以不必再写这篇序言。但是，由于还有许多与作者相关的细节背景可能有助于读者对这部作品的认识，因而在此简略述之，不作展开。

作者奥斯贝克先生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一位船上牧师，师从广受赞誉的伟大的林奈先生。奥斯贝克先生严格遵循他那杰出的导师在《旅游者指南》(*Instructio Peregrinatoris*)里所制定的规则，无论历史、考古、宗教、礼仪、服饰、文字、政策、政府、军队还是国家的文职机关都在他的关注之中，对他来说都同样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作者对于中国特性的观察，证实并肯定了安逊爵士(Lord Anson)对于中国人的判断，这无疑会使这个民族对我们的作者产生好感。

商人们可以在这里发现一份详细而精确的记述，这是一份关于从东方带来的大量商品的记述，其中还有对于中国整个商业情况的准确描述。而经济学家和农民可以在奥斯贝克先生和爱克堡(Eckeberg)先生的叙述中发现许多有用的、让人愉快的记录，对于想要获得高额收益的人来说，这些记录即便是在这个农业和畜牧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相对发达的国家中，也是很好的信息，同时许多相关情况也适用于英国的殖民地和种植园。要之，读者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

对于学习医学、历史、地理及各门学科都有所帮助的内容。

而博物学家更可以在这部非常有用的书中发掘到最丰富的宝藏，由于人们对博物学有相当的兴趣，这部作品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受到理所应当的关注，并且传播甚广，甚至为精英人士以及女性所青睐。我想没有什么比闲暇时阅读这本万宝全书更有意义的事了。

海塞尔奎斯特(Hasselquist)^①穿着英格兰服饰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旅行受到了我们国人的赞许，并且证实了公众从前对林奈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的高度评价，希望本书也能因其所描绘的各种不平常的事物和作者有用的记录，在读者之中赢得同样的声誉。

就这部译作选择从德语本而不是瑞典语原本翻译而来一事，我必须再多说几句。这是由于奥斯贝克先生不但修订了德语译本，并且加入了一些未在瑞典语原本中出现的内容，因此将德语本作为原本非但不损害其价值，反而是有好处的。此书是由戈德利布·乔治(J. Godlieb Georgi)先生在丹尼尔·施雷贝尔(Daniel Schreber)博士^②的指导下翻译成德文的。戈德利布·乔治先生在乌普萨拉学习多年，精通瑞典语，他同时也是林奈先生的学生和友人，发表了许多有关经济、农业和博物学方面的著名之作，特别是一部从植物学和经济学角度对禾本科植物进行描述的著作^③。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受到了许多富有的先生们的大力支持和慷慨资助，请允许我在这里提到他们，因为他们而使此书得以增色。能借此机会公开表达谢意，我深感义不容辞，不但是为了记住他们的名字，更为了表达我心中永存的感念。

① 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学生。(中译者注)

② 施雷贝尔博士为这部作品添加了一些注释，末端标明 D. S 的即是，译者所加之注用 F 表示。

③ 这部作品的第一部分已经出版了，包括 20 幅彩色插图和 27 种不同的禾本科植物，介绍了大量植物学内容，对每一个种类都作了精准的描述，同时对每一物种的栽培、利用和适宜土壤都有相关记录。

自序



1750年，我被瑞典东印度公司选中，作为他们的随船牧师被派往东印度群岛。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早晚宣读祷告词，聆听人们的忏悔，主持领受圣餐的仪式，以问答方式传授教义，探望病人，埋葬死者，并在礼拜日和假日宣讲福音。

航行是枯燥的，因此在我们处理日常事务的间歇，需要有一些消遣。每个人都就各自的兴趣有所选择，而对于我来说，旅行期间没有什么比研究博物学更让我感觉愉快的了。回来后，我也将这种快乐带给了我的朋友们。

我曾在乌普萨拉科学院(science at Upsal)聆听讲演，在那儿学到的知识让我获益无穷。我将所有的钱都花在旅途中以满足我对知识的渴求，以至于身无分文地回来了，然而即使有再多的钱我也一样会花完的，因为我知道，面对林奈先生这样一位渊博的学者，除了博物学上的物种标本以外，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述职的了。

在航海日记中记录下每一种值得观察的事物纯属我个人爱好，我将其中一些对在西班牙、中国以及其他地方所发现的新植物种类的描述提供给了林奈先生，很快地，这些内容都出现在那部不久后出版的极为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里，而我对于